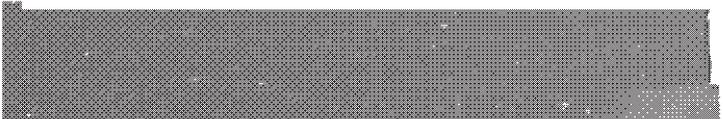


孫中山的田心相心刑學說



著等奇思



說學與想思的山中孫

著等奇思艾

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 目次

- 一、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陳伯達（一）
- 二、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艾思奇（一五）
- 三、孫中山與列甯……………張仲實（四三）
- 四、在抗戰中怎樣學習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柳湜（五二）
- 五、紀念中山先生……………韜奮（六七）
- 六、紀念中山先生……………新華日報（七〇）

## 附 錄

- 七、三民主義研究大綱……………許信文（七五）
- 八、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毛澤東（一〇二）

九、最可紀念的一日……………張仲實（二二三）

# 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

發展

陳伯達

三民主義的創始人，一時代偉大的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與中華同胞訣別了十三年了。中山先生沒有親眼看到九一八以來民族空前的大災難，沒有親眼看到今天全國軍民抗日的大浴血。可是我們知道：日本強盜的壓迫中國，掠奪中國，並不是只在九一八才開始的。在屢次的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中，中山先生都和中國人民在一起。中山先生在世時就是抗日主義者。民國九年，中山先生在美國議員團歡迎席上沉痛地談論到二十一條的問題，他非常中肯而明確地說：「不論現在有什麼商量在這裏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提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指民國七年日本強盜與段祺瑞所訂的中日軍事協定——本文作者註），是

日本製的最強韌的鐵鎖鍊，來綁中國手脚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才歇手。中國的大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它，中國的統一就馬上可以實現」。中山先生在那演講中，還說出了這個事實：當美國參加歐戰的時候，並請中國加入，那時日本便也改變了本來阻止中國參戰的政策，而要求中國和日本聯起來對德宣戰。中山先生「立刻十分擔心，曉得日本這種新動作，是有一個陰險的事實藏在裏頭」。他告訴了上海的日本總領事：「我贊成日本維持中國中立的老政策，但是我要用十二分的力量，來反對把中國放在日本保護底下來參戰的新計劃。」中山先生說：「我那時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單靠外交來征服中國，就在請中國參戰這個表面名稱裏頭，打算着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了。……所有協約國的國家，都要中國參戰……他們不知不覺，就贊助了日本在中國上面得了軍事的統轄。」

中山先生當時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和銳利眼光，洞悉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關於滅亡

中國的陰謀詭計，洞悉了中國內亂之主要的癥結。他看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平日所企圖的是要征服整個的中國，而其征服中國的政策，是隨時勢而不斷變更的。中山先生在那個講演中，就歷舉了日寇關於滅華方式的一些變更：有時候日寇要用外交來征服中國；但情勢變了，日寇便打算經過軍事協定的名義，而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後來情勢又變了，於是日寇「又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當然，以前日寇的應用這些方式，是並不一定在一個時候只用了一個方式的：有時候，主要的是用某一個方式，但有時候——也可說是經常的時候，却又是幾個方式並用的。

中山先生，很清楚地看出了日寇駕馭自己工具的手腕。中山先生指出了：段祺瑞在北方的統治，本來是日本所製造的；但當段祺瑞答應了中山先生關於南北和平的基本條件，由邊防處發一個通電，宣言軍事協約作廢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馬上利用別的勢力來打敗段祺瑞。從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這個事實，更證明了這點：日本帝國主

義者，經常是在中國製造幾個（事實上是無數個）不同的工具的，並時常利用各個不同的工具互相火併，而一當發現到某個工具表示得不十分「孝順」的時候，便即設法去收拾那工具。

中山先生曾經想出各種方法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計劃。在這裏，我覺得最重要的，便是中山先生從自己的政治經驗中所得出的一個結論：「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這個結論，是萬古不滅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不變分化中國的政策，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日本帝國主義者一直到今天，在這向中國進行全面的血腥的進攻的時候，還同時進行分化中國的政策，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使中國避免亡國滅種的道路，問題的關鍵也正在這裏；而漢奸托派所以用全力來挑撥離間，企圖拆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也正在這裏。

本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從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實際發展中形成起來的；當中山先生還沒有形成三民主義的思想的時候，可以說已有具體而微的民族革命統一

戰線的思想。在興中會宣言上，當時中山先生痛心於「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便已提出了這樣救國的見解：「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實質上，這個見解就是一種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見解（當然還沒有「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一個名詞），這個見解就是認爲民族的「羣策羣力」，是救中國於危亡的途徑。到了中山先生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便更進一步，而中國同盟會的組織，就正是當時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具體表現。一九〇六年中山先生在「民報」紀元節的演講中，這樣說過：「今日中國正是萬國耽耽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却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中國人自己統一起來，外人便不能瓜分中國——這就是中山先生當時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就任

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這樣告訴全國同胞：「……行事或虎頭蛇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他還這樣告訴了當時海陸軍將士：「願吾海陸軍將士，上下軍人，共厲初心，守之勿失，弗嬰心小忿，而釀鬪牆之譏……」中山先生當時的思想，就是以爲：民族革命的統一之繼續或分裂，行將決定中國革命的成敗，而要繼續民族革命約統一就必需不互相「狼顧狐疑，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必要不「嬰心小忿而釀鬪牆之譏」。中山先生民元下野之後，仍繼續這樣號召同胞：「羣策羣力，盡心國事」（在蕪湖歡迎會上講演）。民國五年討袁以後，中山先生又向同胞號召：「國家之強，在合羣力」（在紹興演講）。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運動走上了新時代，中山先生在這新時代中，重新振作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旗幟，因而有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因而有了偉大的三大政策的決定，因而有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因而在中國革命史上實現了第一次最明顯的、自

覺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也正因爲是有了這新時代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三民主義更擴大了自己的革命生命，更充實了自己的革命內容；而在那時候，中山先生就正在自己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向中國民族做了這樣的歷史號召：「列強爲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爲他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我們要能够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够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

中山先生這裏的思想，一方面主張自己國內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又主張與國外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一切被壓迫者成立抵抗強權的統一戰線，而首先要實現自己國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才能實現與世界成立抵抗強權的統一戰線。中山先生這種思想的發展是很偉大的。這種思想和革命的實際政策（即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

大政策）結合起來，因而成就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勝利，因而擴大了三民主義的思想到廣大同胞的腦海中，使三民主義思想上的力量變成了物質上的力量。

我們現在又臨到了另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我全民族最後死活的戰鬥的時代。當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用二十一條和軍事協約的鐵鎖鍊來綁中國的手腳，而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却已用了世界歷史上未有的殘暴無倫的血腥手段，大規模地殘殺我民族，掠奪我江山。半個神州已陸沉在日寇侵略的血海中，幾乎半數的同胞已陷於亡國奴的境地。在日寇所到的地帶，我男女同胞被日寇屠戮、劫掠、姦淫的慘狀，簡直在世界亡國史上是曠古未有的。這種慘狀，比較中山先生當年所痛心的，滿清入關時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不知遠過了多少千百倍。中山先生是早已逝世了；中山先生不及見到今日我民族這種慘狀；可是中山先生在世時所指示的道路，「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抵抗日本的壓迫」——這條道路，正是我國目前全民族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的道路，這條道路，在今天不是別的，在今天，這條道路，就

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惟其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的敵人太多，太強。」（斯大林）。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問題的提出，就正是中國這種複雜的實際生活的反映；「三民主義」這個題目，正是告訴了我們，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太多，太強的。惟其是如此，中國革命時常要經過統一戰線，來集中一切力量，以便戰勝強大的敵人；而今日這最窮兇極惡的強大敵人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今日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誠如中山先生的定義，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救國主義在今天，就是抗日主義，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今天救國的道路，同時也是今日實現三民主義的方法或手段。

三民主義在目前新的大時代所發展的特點，是依賴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鞏固和擴大的。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在這統一戰線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全國抗日大浴血，那末，三民主義在今天就只能限於是抽象的原理。三民主義在今天，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分開的，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但這不是說，在中國革命進行的每個具體過程中沒有主要的一環。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中，是以反滿爲第一；爲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首先把滿清對於國內民族的壓迫推翻，這在當時會是一種正確的步驟；爲了爭取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實施，首先把當時最反動最腐敗的專制政體的代表者——滿清朝廷推翻，這在當時會是一種正確的步驟。在我們現在，三民主義是以抗日爲第一；三民主義的實施，首先要從抗日做起；而要抗日，就不能不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這抗日第一的當中，又不是說，應當把三民主義的整體分割爲許多不相關聯的小塊；要得到抗日的最後勝利，是需要在抗戰中不斷地改正我們國家政治上的弱點，盡可能地實行人民合理的負擔的；而要實行這些，又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什麼呢？因爲，只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保障抗戰到底，而只有抗戰到底，才能達到抗日的最後勝利，而只有抗日的最後勝利，才能達到實

## 現真正全部的三民主義。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今日，對於中國命運和三民主義是有決定一切的歷史意義的，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固和擴大，則有賴於每個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所持的態度怎樣來決定；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態度最具決定的意義，因為今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事實上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對於一切合作的政黨和羣衆團體，中共是主張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可以說，中共這主張，是完全合乎中山先生的思想的。民國元年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說過：「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在自由黨演講）。民國二年，中山先生更在國民黨上海懇親會上這樣勉勵自己的黨員：「……黨勢之大小不必問，只須問吾黨所主張之政策及平日行動之能合乎公理，能否與時勢相應。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確，且得一般國民之贊同，雖千難百折，必可望最後之戰勝。至於對於他黨，除商榷政見而外，一切意氣之爭，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損政黨之榮譽。」中山先生這段話，是光明

而偉大的，而在今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這段話是最爲值得每個合作的政黨來服膺的。我們知道，日寇、托派、漢奸就正是企圖挑撥我們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關於政見的商權的，就正是企圖在合作的政黨間挑撥起意氣之爭來代替政見的商權，來損各政黨的榮譽，並從而來拆散我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大家應當服膺中山先生的關於「每個政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的指示，關於商權政見和排除意氣的指示，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回答日寇、托派、漢奸的挑撥。

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到底，則無論如何，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很了解當前的敵人是強大的敵人，但是中山先生早已告訴了我們：「心堅則不畏大敵。」（民國五年在歡迎從軍華僑大會上演講）。強敵是不足畏的。在強敵面前，必要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在人人心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然後才可有爲」。（民元在報界公會上演講）。中山先生曾不斷地說到關於弱者戰勝強者的真理。關於

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山先生明白地指出是：「國民有堅忍心，武昌軍界有冒險心，無畏難心之故。」中山先生在民元年舉出一個歷史的事實：「前年英法開釁，英有精兵四十萬，甲於環球；而脫之全國人數，亦不過四十萬，且軍士皆以農夫充之。就強弱言，英國何難一舉而滅脫？所以不能即勝者，因脫人有合力堅忍無畏之心，而能持公理敵強權也。」（在環球中國學生會講演）。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山先生關於俄國革命的抵抗列強干涉，更這樣稱道過：「：俄國新創設之政府：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軍人精神教育）。綜合中山先生上面關於幾個歷史事實的了解，他所要告訴我們的，第一即爲合力，第二即爲決心（也即堅忍無畏）。在今天，循着中山先生所指的這種方向前進，即是抗戰的最後勝利。

——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年紀念日作——



# 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

艾思奇

## 一 爲革命而戰鬥的哲學思想

在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裏，要把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從各方面作充分的說明，是不可能的。這裏所能講到的，只是它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兩三點。我對於中山先生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的印象，我感覺到它是生動、實際，而且貫徹了戰鬥性。這一個特性，要在中國近年哲學理論的專門學者們的思想裏去找，是困難的。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從全體上來說，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辯證法唯物論自然不同，但在許多地方，仍然可以從它裏面找到豐富的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要素，這便我們就是站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立場上來看，中山先生也有着不少的寶貴的貢獻。

這並不是什麼奇事。從社會的基礎和本質上來說，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哲

學。但這一個哲學的內容，對於其他派別的哲學並不是絕對孤立的東西，它是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發展的總的成果。凡是在歷史上有着前進意義的哲學思想，都包含着辯證法唯物論的某些方面的種子。中山先生的思想，是在他一生的革命戰鬥中培養起來的，它必然是充滿了革命性，因此也必然和辯證法唯物論有許多接近的地方。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們也就這一方面多發揮一點。

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之所以富於戰鬥性和革命性，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把理論當作純粹的理論來研究，他是爲着革命鬥爭而建立理論，他的理論，總是針對着、配合着一定的革命的實際任務，都是以解決某一個實際問題爲目的。「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一書，可以說是中山先生發表他的哲學思想的著述。爲什麼要寫這一本書，在他的序言裏就明白地告訴我們是爲了政治的要求。滿清推翻了，但革命總是不能成功，因爲革命需要在破壞之後再來建設，而一提到建設，就受到了同志們的非難，說：「先生之策，闕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何？」人人都以爲中山先生理想

太高，以爲他所提出來的一切意見都沒有實行的可能。這是在實際問題上碰到的極大難關。這難關使他「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究其究竟，幾經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於是才知道：「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爲知爲易而以行爲難也。」他以爲知易行難的思想，是「數千年來，深入於中國之心，已爲牢不可破」，因此使他的「建設計劃，一一皆爲此說所打消」，知易行難的心理，他認爲是他「生平之最大敵」，「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因此爲要謀在政治上能够成功，他不能不「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這不是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甚爲着政治的要求，爲着要使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能够順利地見諸實行，爲着要在這樣的目的前面來和他的反對者們作思想的鬥爭，才建立起來的嗎？

這是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中最重要而又最可貴的要素。在中山先生那裏，離開實

際任務的，懸空的，純理論的研究是沒有的，他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服務於革命的政治鬥爭的學說。使理論服役於政治，這樣的事情，在某些自以為公平無私的哲學專家們看來，一定要覺得非常不快。他們一定要說這算不了什麼理論，這只是政治上的宣傳鼓動的工具而已。倘若哲學這東西真的不能沾染絲毫政治的塵埃，那麼中山先生的思想裏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哲學基礎了。但可惜專門學者們的見解恰恰是忘記理論與實踐的關聯。所謂理論與實踐的關聯，不僅是說理論是從實踐產生，理論又可以反過來指導實踐。僅僅這樣，只是庸俗的機械論的了解，這還免不了把理論與實踐當作兩個分離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只看見因果的關聯。辯證法的了解是要看出兩者密切的統一：理論就是實踐的一個要素。理論是爲了實踐，服役於實踐，而且以一定的實踐的立場爲立場的。

這是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接近的一點。世界上自然有許多僅僅是掛招牌的辯證法唯物論者，但真正辯證法唯物論，都是坦白地承認自己社會的基

礎，公然地有意識地爲着一定的歷史時期的政治方針而鬥爭。在蘇聯，辯證法唯物論是爲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政方針而服務；在中國，辯證法唯物論是要爲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是要爲着全民族的利益，爲着將來自由幸福的民族共和國而鬥爭的。

孫中山先生也公然地承認着他的哲學思想的政治意義：「予之所以不憚其煩——他在「孫文學說」第五章裏這樣說——連篇累牘，以求發明知難行易之理者，蓋以此爲救中國必由之道也。」救中國的革命的實踐，是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的前提，行易知難的學說，是救中國的實踐的一個要素。不是理論高於實踐，而是實踐決定理論。這豈不是失去公平研究的態度，在理論中摻進了主觀的要求，而不合乎科學了嗎？其實這才是真正合乎科學的。一切真正科學的理論，決不是毫無立場的理論。就是自然科學家，他也要站在實驗的立場上，爲着改變一件自然的事物，爲着完成一椿預定的實驗，而發明理論或改造理論。決沒有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會離開實驗的任務而高談空

測的法則公式的。革命的政治家，就是一個社會的科學家，他不是改變一件自然的事物，而是要變革社會。整個的社會，就是他的實驗室。他要把一切力量用到他的偉大的實驗上去，要在變革社會的實踐當中去創造理論。如果一種自然科學的真理的理論能夠幫助某一新的實驗的完成，那麼，能夠有力量服務於變革社會的實踐，能夠幫助這種實踐的完成，這樣的理論，難道還沒有科學的真理嗎？自然，理論也有錯誤的場合，這時它就不一定能和實踐的任務適合起來，而須待加以批判和改正，然而，只要這種理論是意識地服務於實踐的，那麼它的創造者在基本上就不能不算是有了科學家的態度。

這樣，科學的哲學思想，是要反對客觀主義的。客觀主義在理論上就是要主張「公平無私」的，純理論的，也就是無立場的客觀的研究。這就是等於自然科學家離開實驗，而單憑個人頭腦的空想來發見物質變化的法則和理論。這樣的理論，事實上決不會有真正客觀的眞理性，事實上仍然只會成爲主觀的錯誤理論，不是誰也能明

白的嗎？客觀主義的純理論的虛偽性，不是很容易證明的嗎？自以為是新一「物質論」的正統派的葉青，不是曾經企圖把辯證法唯物論作為「純理論」來研究嗎？而在現在他不是把這「純理論」發揮到政治問題上來，而成了俗惡有毒害的，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無恥的思想了嗎？

這裏應該說明，實踐和「實務」或「實際主義」完全不同。我們說的實踐，是一貫的，改造社會的革命行為，不是投機取巧，今天左，明天右，專以謀得個人利益為目的的政客的實際主義。為政客的實際主義服務的思想言論並不是理論，而是沒有定型的花言巧語，是欺騙，和革命的政治鬥爭中建立起來的一貫的理論絕不相同。在中國的政壇上，這一類搖擺不定翻雲覆雨的實際主義者確是多如牛毛。但為救中國而奮鬥了四十年的民族革命者孫中山先生，是絕不應該被拿來和他們相比的。

胡適先生曾說，中山先生是真正的「實行家」，因為他有理想，有遠見的計劃，並且能「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法」。而那些自以為「專尚實際不務空

談」的政客們，却「算不得實行家，祇可說是胡混」，這是很對的。這一個革命的實行家，是把他的哲學思想也全然貢獻給他的「實行」了的。這一個哲學思想（主要的<sub>①</sub>是知難行易的學說），是貫徹了政治性，也就是貫徹了黨派性。胡適先生說「孫文學說」<sub>②</sub>「這本書不僅僅有政黨作用」而且「有正當作用」，這意思也等於說中山先生的學說，不僅僅有黨派性，而且有真理性。這話也相當對，然而還不夠。我們還要進一步說，正因為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有革命的政黨的作用，所以才有正當作用，正因為它有黨派性，所以才有了真理性。因為它是服務於大政方針革命理想的實踐，所以才有了許多科學的真理。

## 二 知難行易學說中的唯物論要素

現在要談到中山先生的哲學上的中心思想，即知難行易的學說了。有一件很令人發生興趣的事，恐怕一般人都沒有注意到：我們都知道許多人對於中山先生生平的事

解是說他理想太高，不能「實行」；然而很少人注意還有一個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誤解，那就是梁啟超說他的「爲目的而不擇手段」，說「孫君之所以能成功者在此」。這又好像說他是善於「實行」。對於同一個中山先生，人們的看法竟有兩種。其實兩種看法都只是看到他的一面，不能包括他的爲人做事的全貌的。只看見他的救國理想而看不見他怎樣爲這理想而努力奮鬥，於是乎說他只有理想；只看見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奮鬥而不知道這一切方法和他的理想目的的聯繫，自然要說他是不擇手段。然而能够用一切的方法去求理想的實現，正是中山先生的特長點。如果我們把他知難行易學說裏的知字先拿來研究，那麼，我們就可以發見中山先生的所謂知，是不但要「知」道理想和目的，而且要「知」道一切達到目的的方法手段。不但要「知」道根據，依據一定的根據來決定我們的目的理想，並且要知道做的條件，通過這些條件去求得目的理想的實現。

爲什麼中山先生認爲知難行易是真理，而中國人千百年來偏要相信知易行難？這

原因，是由於相信知易行難的人所了解的知並不是科學的知，透澈的知。知得透澈，做起來就容易，知道得不透澈，做起來就困難，甚至於無從做起。所謂要知道得透澈，就是不但要知道應該做什麼，那就是目的和根據，而且要知道怎樣做，那就是手段和條件。然而一般人對於事情，只看見了一個目的理想，就以爲算知了，不求再知道怎樣做。這樣的知，要拿來實行，自然是覺得沒有憑據，沒有辦法的。僅僅以這樣的知爲滿足的人，要他不相信知易行難的錯誤思想，是困難的。在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國民黨員的演講裏，中山先生曾講到使工人和農民合作的問題，要實行合作，他認爲是不難實行的，並且說：「難處是由於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於不知道怎樣去行。」要實行，這目的是誰也容易明白，但怎樣實行，却不是容易知道的問題。然而這正是中山先生的「知」裏面所要求的。中山先生對於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也不僅僅是徒有理想，他以爲中國「欲由革命一躍幾於共和憲政之治」，也必須經過一定的條件；他認爲「中國人民知識太淺，政治能力太差，要實現共和，必須創一過渡時期

爲之補救」，那就是訓政時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不管他對於人民的這種見解是否正確，不管這訓政時期的創立是否要有人反對，但達到目的必須有一定的條件方法，這根本的見解是無論如何可貴的。在這裏，中山先生不但不是一般人所誤解的那種只有理想而無實行的空談家；相反的，他自己正反對那種輕浮躁進，有名無實的空想革命者，倘若我們把這歸入左派幼稚病患者之列的話，那麼中山先生是在這一個問題上曾經反對過左派幼稚病的。同志們不了解他的「行約法之治」的訓政時期的意義，想不經過任何條件即一直達到理想的共和憲政。他在「孫文學說」第五章裏批評到這樣的一個錯誤：「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祇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憲法，以爲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當時衆人之所期者，實爲妄想，願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爲難行，抑何不思之甚也。」所謂知，用哲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認識。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裏對於知字的理解，就是他的哲學思想中的認識論。認識論是有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分別的。中山先生

的認識論是屬於那一方面呢？倘若以爲認識只是屬於人的主觀理想範圍內的事，那就是唯心論的認識論。但中山先生的認識論却不是這樣，他不但要以事實上的要求爲根據來決定理想和目的，並且要從事實的具體發展情況中去探求達到目的的一切可能條件。這在梁啓超先生看來，就以爲是「不擇手段」，那意思也就是說他濫用手段，或者是連不正當的手段也要用。其實中山先生能够不斷地尋求手段，正是中山先生之所以爲中山先生的過人的地方，這種探索尋求一往無前的進步精神，是任何頑固不化地只知道拘守着一種主觀上自以爲是正當手段的人們所萬萬不能及的。這樣如果就算是能够擇手段，那麼，至死不忘光緒皇帝的康有爲先生，就要算是最會擇手段的了。然而這只不過是完成了個人的封建的節操罷了，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益處呢？中山先生不是這種故作謹嚴的道學家，在他，救國救民族的任務是高於一切的，個人的操守是絕對服從於這最高的任務的，爲着完成最高的任務，中山先生是不斷地進行着自我批評，不斷地在事實中間去尋求更正確的方法和手段，中山先生是和一切固執主觀成見的

人完全不同的。直到民國十三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裏，他還講述：「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祇需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致如今日之一無成績。」這種求進步求「知」的熱烈精神，正是所以要使梁啟超先生說一句「孫君之所以成功者即在此」的理由。成功嗎？中山先生是決沒有以革命的成功者自居過的，然而他能屢敗屢起，愈挫愈奮，再接再厲，時時刻刻站在時代的先頭，沒有像其他的人那樣沒落下去，這是他的不成功中的成功。這正是由於他的「知」，是以事實的根據和條件為基礎的。適合於中國現實情況的發展的知，正由於他的認識是唯物論的認識。「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即漸於老朽頹廢，靈明日蝕。」他在「軍人精神教育」一篇演講裏說的這一段話，正是他的認識論的唯物論要素的反映。

只知理想，不知方法；只知要做，不知怎做；只知目的，不知手段；只知根據，不知條件；這就是主觀的知，唯心論的知，不是中山先生所要求的知。這樣的知，自然是「易」的，然而不是真知，只是俗流的淺見。中山先生對於俗流的淺見是沒有關係的，他並且明白地反對俗流的淺見的錯誤，而極力擁護科學的真知。在「孫文學說」第五章裏，他說：「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者，此數千年來思想見識，習爲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大謬不然矣。」中國古來常說螺贏以螟蛉爲子，於是稱人的養子爲螟蛉，而從科學上研究起來，才知道，螺贏並不是把螟蛉作爲自己的子，而只把它弄成自己的子的糧食，普通人只從表面上看事情，所以不能夠了解到真正的事物的內容。如果以這樣的知爲知，那自然也是很易的，可惜不是真知識，而一般人偏偏要以這種「知」爲滿足，所以中山先生說：「吾國人之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爲子之事耳。」這就是說，俗

流的淺見是只看見表面的現象或假象，而不能夠滲透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質裏去的。中山先生，不但是要依據客觀事物來獲得認識，而且要求事物的本質的認識。本質的認識，是只有藉科學的力量才做得到的。

以上是從「知」的內容方面來說到它的唯物論的要素，從知的根源方面來說，又怎樣呢？中山先生曾把「智」的來源分爲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軍人精神教育」）。依據這三種「智」的來源的分別，中山先生又把人類也分作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那麼，從來源上說，中山先生似乎是說人類中有天生的認識，不待學習經驗，就可以獲得真理，也就是真理不必來自物質現實的反映，而可以憑人的主觀自生了吧？如果知識可以不必建立在物質現實的反映上面，那麼，從知識的來源上就只好承認唯心論的正確了。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若加以認真的分析，那麼，中山先生智由天生的見解也並不見得就是唯心論的認識。

的見解。這裏所說的是「智」由天生，並不是說「知」由天生。也就是說，人的聰明寶質可以得自天賦，但這並不是指認識得自先天。有的人生來有一種特別明敏的認識能力，他的願腦的構造特別健全，不必依靠別人已發現的知識（即經過力學、「集合多數人的聰明以爲聰明」），不必一定要依靠親身經歷（即經過經驗）能夠獨力找到事物中的新的知識，發明前人所未發明的道理，這就叫做先知先覺。先知先覺的認識，仍是對於物質世界的認識，他雖然有過人的發明和發現的天才，然而過人的也只是天才，只是智，只是特別敏銳的觀察和發現的「能力」而已，至於他的發明發現的內容、他的「知」、「認識」，仍是根源於現實的物質世界，仍是「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中山先生決沒有說先知先覺者的知識是完全由天然生成的。

我們試進一步研究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就可以證明在知的來源這一方面，中山先生的學說也是有着唯物論的要素的，就「知」和「行」的關係來說，中山先生告訴我們的是行在先，知在後。也就是實踐先於認識。最大多數的事情，我們

常常是不自覺的做了，而對於所做的事情的真正的內容，自己仍然不知道。「行」爲什麼「易」呢？因爲不知亦能行，不知的時候我們已在行之。中國人最善於飲食之道，而對於飲食衛生的科學一點不知，人們天天在用錢，而對於錢的真正的性質通常都沒有真實的了解，只有一個錯誤的金錢萬能的觀念。國家的變革大事，也常是首先由不知而行的。日本的維新變法，當初也並不是有意看清楚了維新變法這一條道路去做的。最初不過是由於他們「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勵國民，是猶義和團之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第五章）在變法維新運動中，日本人的無知，也和中國的義和團是一樣的。然而不知不覺之中，「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這就是說，日本自以爲是在做尊王攘夷的事業，而不「知」實際上所行的是「師夷」。「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

行在先，知在後，是中山先生在認識來源問題上的唯物論的見解。這是說事實

先，知識在後，認識是在實踐之後產生的。在這裏，中山先生不但有了唯物論的認識，而且反對了唯心論的認識論，即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知行合一說是主張即知即行，即行即知。如果說即行即知，那麼行和知就是同時，然而中山先生是認爲行在先，真正的知在後。和行同時的知，自然也有的，然而那常常只是僅看見表面現象，不能滲透到本質的不正確或至少不完全的知。如果以這樣的知爲滿足，那就是以主觀的現象的認識爲滿足，這是唯心論的。如果說即知即行，那就是說，知道了的時候就要來行，因此，不知的時候也就不能行。這種見解，仍沒有超出知易行難的錯誤思想的範圍，它的目的不過在於勉人行難，本身並不是真理。「推其意，彼亦以爲知之非艱而行之維艱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畏，既知之，則當行，故勉人以爲其難。」「其勉人爲善之心誠爲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爲易，以易爲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所以，雖然用心良苦，「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真理是知難行易，不知亦能行。要得到知識，常常是在反覆實行之後才能達到的。」

結果：「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這幾句話，使人想起了恩格斯用能力轉變法則做例子，向我們證明的關於人類認識的真理：人類從太古以來，實行鑽木取火的方法，不知多少萬年，才發現了摩擦生熱的道理。又過了不知多少年，才知道，一切機械力都可以轉化成熱的法則，再經過不少的研究，又才知道各種能力（如熱、運動、摩擦、光、電力等）都可以互相轉變。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由行到知的過程，這過程不是和中山先生所說的話很相似嗎？

由不知到知，由不認識到認識，都是在不斷的實踐行動的基礎上發展着的過程。能這樣來把握認識的問題，不但是唯物論的，而且是辯證法的。因為舊的機械唯物論都不能了解到認識發展中人的主觀努力和實踐行動的作用。舊唯物論都以為認識是直觀的，也就是說認識並不是在人的實踐動活中發生發展，而是外物在人類頭腦中消極的反映。在這種觀點之下，人並不是改變世界的實踐的主體，而只是一面不能自動的

鏡子。知識的增加，僅僅是由於新的外物的出現，人類不能在改變世的實踐中去愈深刻地認識事物。這種對於認識的直觀的了解是怎樣錯誤，只要看一看本文的第一節就可以了解了。科學的真理，是在一定的實踐的立場上和行動中才能達到，自然科學有它的實驗的立場和行動，社會科學有它的黨派的立場和行動。沒有實踐，沒有行動，就不能獲得真知識，想先求知而後行動。那就是想離開實踐先來求理論的了解，是不會成功的，至少還不會使我們得到真知，所以中山先生說：「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不下水游泳，而先懂得游泳的方法，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山先生特別強調「冒險精神」的重要，不知也要行，行了以後再來求知。並且告訴我們，向不知到知，也是要靠冒險精神的。「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能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上都引自第五章）「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事者，乃人類文明之動機也。生

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發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的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爲人類所皆能，亦爲人類所當行。」（第七章）有這樣的冒險精神，在行動中就可以獲得知識更依據知識，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的實行。這叫做「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由實踐到認識，又由認識到新的實踐，這樣的過程的了解，是合乎辯證法的。所以，從認識論這一方面來說，也可以證明：在全體上，中山先生固然是辯證法唯物論者，然而却可以給我們在他的思想裏找出這麼多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要素。

### 三 物質和精神的關係

中山先生強調冒險精神的結果，有時，對於精神的作用就特別加以讚揚。在「軍人精神教育」一篇演講裏，他把物質和精神作了一個比較。以爲「物質之力量小，精神

之力量大」：「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資能力，僅得其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由打破武昌開始，而「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此次北伐，亦惟有精神能制勝，可勿問敵入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在這些地方，自然會有人說：這是有點唯心論的傾向的。又如關於人類社會的問題，中山先生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把物質生產關係的發展作爲社會的基礎，却給與了一個觀念的原則：互助。「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不論人類社會的體和用，都是建築在互助這一個觀念原則之上的。在這裏，又會有人要說，中山先生在人類社會的問題上，是屬於唯心論者的。

雖然如此，中山先生的整個哲學思想在基本上仍可以說是唯物論的，試把他的關於物質和精神的關係的思想拿來研究一下，我們就會明白：雖然他也有點西洋的舊唯物論那樣，在人類社會的問題上，常常把精神的要素誇揚起來，但這並沒有使他整個的思想，在基本上離開了唯物的原則。

中山先生反對把物質和精神絕對分離。「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也。」「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司之。」這樣的見解，如果有人把它看做二元論，是不對的。二元論是把物質和精神同樣都看做相對相等的兩個體，兩者互相分離。而中山先生恰恰是明白地反對了這樣的思想。中山先生的思想決不是二元論，而且是傾向唯物論的。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物質才是體，精神却是物質的用，也就是物質的作用。這是唯物論的傾向之一；其次，中山先生以精神爲物質之用是專指生物界特別是人類而言，離開生物的範圍，就無所謂精神之用了。在無生物的現象裏，體用都是物質的東西。在「孫文學說」的第七章，講到鋼、鐵、機械和炭、油、汽、電在實業中的關係，他說：「夫鋼鐵者，實業之體也，炭油汽電者，實業之用也。」可見精神這種作用是不能離開一定的物質的範圍的東西，中山先生從沒有說過離開了生物界的範圍還有精神作用的存在，精神

是以一部份高級發展了的物質爲基礎的存在。物質比精神的範圍廣大，物質存在在精神之先。在中山先生的思想裏，並沒有那把物質和精神的體用關係普遍到全宇宙裏的俗流思想（樸素的、俗流的唯物論思想）。我們不能說他的思想不是以唯物論爲基礎的思想，我們只能說，他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唯物論仍有些不同。辯證法唯物論認爲物質本身運動變化都有自動發展能力，而在中山先生，物質是不會自動的靜體，它的運動變化，須待另外的「用」來加以推動。炭油汽電推動鋼鐵的機械，精神的「用」推動物質，使能言語動作。因爲這樣，所以才會說物質的力量小而精神的力量大了。

再說到精神，承認精神作用的存在，不一定就是唯心論的思想，問題是要看對於精神是給與了唯物論的了解或唯心論的了解；唯物論也不一定否認精神的作用，它只是把精神放在物質的基礎上，把精神理解作物質的反映，而不是脫離物質的獨立精神。中山先生給軍人們講精神教育，對於精神的作用，固然是估計得很高。但我們試一研究它的內容，那又可以看出它決不是一種懸空而無憑據的精神。中山先生規定軍人

的精神的內容是智、仁、勇三者。這就是說，智、仁、勇三者，是軍人這種物質基礎上所必須具備的精神，有軍人（並且是革命的軍人），才有智、仁、勇的精神。而這智、仁、勇三種精神，也不是空洞的道德公式和教條，中山先生對它們作了新的解釋，給與它一種適合於革命軍人的物質存在的內容。我們看見智仁勇三個字，也許會發生厭惡，以為中山先生是在講舊禮教，而其實它却有着很現實、很能反映現代中國軍人生活的解釋。智是要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務、知彼己就是要能從事非、利害、時務、彼己等方面去認識現實事物。仁是博愛，軍人是要有「救國之仁」，要為三民主義而戰，這樣的仁，也不是空洞的。軍人的勇也不是鹵莽滅裂的勇，是要「長技能」，「明生死」。而在長技能這一點，又根據着中國現實的物質條件，規定要有游勇戰術的技能。那就是要能够「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喫」。

•「這「游勇戰術」的技能，不妨說就是今日的游擊戰術的一個思想方面的發端。

根據以上所舉的一切，已够說明中山先生所理解的精神，決不離開物質，而是以

物質現實爲依據，在物質現實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東西，這樣的精神，也正是唯物論的精神。然則，爲什麼中山先生另一方面又可以把精神的作用加以誇揚，說它的力量是高於物質，而且唯有它才能戰勝一切呢？這一方面是由於沒有在物質本身看出自動的能力，於是就不能不以爲精神是一切的推動力。一方面也因爲事實上精神對於物質也確有着相當的推動的反作用。而在中山先生的政治鬥爭的實踐中，對於這種精神的反作用的誇揚，有着迫切的需要的緣故。

中山先生一生爲中國革命而奮鬥，雖遭受多次失敗，仍然百折不回，繼續進取。辛亥革命成功，本來想趁此機會把他的「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不料，在革命同志中間，右傾的思想忽然抬頭起來，破壞雖然告成，而對於建設却沒有人看重。中山先生的計劃被人人認爲理想太高，而致不能實現。此後屢次的革命鬥爭，都因爲革命同志中間右傾機會主義的不斷的發生，又遭到了多次的失敗。對於傾機會主義的爭鬥，成了中山先

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一切活動中不可分離的任務。右傾機會主義的一般特點，就是對敵人害怕，而對自己的勇氣和力量不能信任，只看重眼前利害，而不顧將來的目標，于是乎小則行動遲疑，坐失時機，大則妥協投降，斷送一切。這一方面最大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圖謀稱帝時，中山先生是怎樣主張出其不意地以先發制人的迅速行動打倒他，而革命同志們却總是遲疑不決，以致於坐誤一切時機，結果歸于失敗。這在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信裏說得非常詳細明白。要打破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必須首先提高自己的勇氣，提高對於自身力量的信任，消滅對敵人的恐怖心理。中山先生對於精神作用的某些誇揚，是在這樣的實際鬥爭的要求裏可以找到它的根源的，基本上那並沒有離開了唯物論的原則，因為，就是說到精神作用的發揮，中山先生也沒有忘記要依據時勢才能够完成。在時勢成熟的情形下，我們的精神力量的發揮，才能够「如摘已熟之果，穫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便利，毫不費力也」。時勢成熟，我們的精神努力就有決定的力量，「若推石下山之例，順

而且易，祇問推之與否」。重要的也就是「祇問推之與否」，如果不推，縱有好的時勢也是徒然的。

在目前的抗日戰爭前面，中國民族所碰到的困難很多，而且將來還要更多的。右傾機會主義會要不斷地出現，來防礙我們神聖的抗戰。我們的抗戰是在完成中山先生救中國的遺業，爲着這樣的目的，我們也要接受中山先生精神上的遺產，接受他的理論的精華和他的一切革命鬥爭的經驗，並且把他發展起來，我們要用一切力量防止和消滅妥協投降的右傾思想，團結我們的力量，加強我們的戰鬥勇氣，堅定我們的最後勝利的信心。務必要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以彌補中山先生終生不能施展他的建設計劃的遺憾。

## 孫中山與列寧

張仲實

本月二十一日，是蘇聯革命的偉大導師——列寧逝世的十四週紀念日。列寧差不多人人都曉得，用不着記者多囉嗦。他的事業——偉大的十月革命，已經決定了他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位置；他的遺產——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經表明了他的對人類貢獻的偉大。不論是蘇聯的友人或是蘇聯的敵人，一提起他，沒有不表示佩服，肅然起敬的。

列寧不僅是俄國人民的領袖，而且是全世界勞苦大眾和被壓迫人民的領袖。尤其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在二十五年前（即民國二年），他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帝鬥爭就寄着無限的深厚同情。那時（民國二年五月）他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抨擊「日趨腐化」的歐洲資產階級，而熱烈稱讚中國

人民的醒覺。一般人視爲文明和先進的歐洲，在列甯的眼中，爲什麼成了「落後的歐洲」？因爲「歐洲的統治的資產階級」，「幫助亞洲的反動勢力」，「掠奪中國」，「幫助中國民主自由的仇敵」，「贊助那準備實行軍事專制的袁世凱」。一般人視爲落後的亞洲，在列甯的眼中，爲什麼成了「先進的亞洲」？因爲「在亞洲，強大的民主運動却到處增長，擴大和鞏固」，「在這裏，資產階級還與人民一同爲反對反動勢力而奮鬥，幾萬萬的人民已在睡夢中覺醒過來，爭取生存，爭取光明，爭取自由了。」列甯的這句話，正好像描寫目前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現實一樣。在二十五年前，他就看清了中國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鬥爭的偉大意義，這證明他的觀察是如何的銳敏，他的識見，是如何的遠大！

這暫且不在話下，記者在這裏想乘列甯逝世十四週年紀念的這個機會，提出別一個問題來談一下，就是記者最近閱讀中國革命的偉大導師——孫中山先生的著作，覺得他當年對於列甯，對於十月革命的性質，以及對於蘇聯的本質，也有着獨到的見解

他的觀察的敏銳，識見的遠大，都高出於一般的水平，都值得我們特別的佩服！

列甯逝世於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即距十月革命，剛剛六個整年多些。那時，蘇聯一因內戰數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二因實施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不久，怎樣新的建設，還談不到。因此，一般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報紙，對於列甯個人和俄國的革命，都盡誹謗、誣蔑、嘲笑的事。但中山先生則不然，他對於列甯和俄國的革命，却拿另一個眼光來觀察，而表示着無限的敬意與同情。

當列甯逝世的悲耗傳到的時候，正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的當兒。他馬上在大會上提議去電哀悼，並在演說中對於列甯稱讚道：

「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甯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上之完善。故其爲人，由革命觀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

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據中山全書，三集一五八頁。）

關於帝國主義者攻擊列寧一點，中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道：

「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爲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

直到現在，還有一部份人，做帝國主義的應聲蟲，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它的對外政策「與從前的帝俄沒有什麼區別」。然而中山先生在十四年前，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就有極深刻而正確的理解。他認爲「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同上書，一集六一頁）「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同上書）。他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更明白的說道：

「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

命最大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五二頁)

關於革命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本質及帝國主義反蘇聯的原因，中山先生很確定地說  
遺：

「自歐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利害，因為那種和平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起恐慌。」(一一頁)

基於這一認識，所以中山先生，很堅決地主張中國的民族解放，「應聯合以平等

待我的民族」，尤其聯合蘇聯「共同奮鬥」。同時，我們從這一認識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所定的三大政策之一——聯合蘇聯，並不是「以夷制夷」，也不是「遠交近攻」的意思。他對於蘇聯善意的幫助中國一層，深信不疑。他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裏面說道：

「……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前大不相同。……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爲我海外同志宜放心者也。」（同上書，三集一六三頁）

他在彌留之際，還不忘記「我國的將來」，特致蘇聯遺書一封，「熱烈的希望」蘇中繼續合作下去。他爲中華民族謀解放的偉大苦心，他對蘇聯相信的深切，在這一封遺書裏面，充分的表露了出來。在今日我們正以血肉與日本強盜作敵死我活，我活敵死的大搏鬥中，我們把中山先生的這封致蘇聯遺書，有再三恭讀的必要。記者想，凡稍爲熱情之人，讀了這封遺書，都要感動得流下淚來。茲將遺書中最動人的幾句話，錄在下面，獻給讀者：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甫遺與被壓迫民族的普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作共作。……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的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而且中山先生魄力的雄厚，實非常人所及。他的聯蘇是很公開的，並無絲毫的顧慮，十三年冬，先生北上，路經長崎，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新聞記者去訪問他，問到「廣東政府同俄國親善」的問題，在常人也許要用外交辭令，含含混混地答一下，但中山先生則不然，地坦白地答道：

「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

，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

中山先生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能與時代俱進，不放棄革命的立場，隨時吸收他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他爲了求中國民族的澈底解放，不僅這末堅決地主張聯合蘇聯，而且堅決地並虛心地主張學習列甯所領導的俄國革命的精神與方法。他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及其後的歷次演說中，一再側重指出，過去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方法的不好，和氣魄的不够，他在歡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的會席上說道：

「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澈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同上，一五一頁）

中山先生很明白地承認，俄國的革命，對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爲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

黨一樣。L（同上，一五一頁）由此可知，中山先生於十四年前毅然決然的把國民黨加以改組，並確定以聯合蘇聯，國共合作，及扶植工農爲三大基本政策，實在有着極遠大的見識啊！

在我們對日高舉抗戰旗幟的今日，我們應當以學習列甯和孫中山的革命精神，抗戰到底，來紀念這兩位二十世紀偉大的革命導師！

于列甯逝世十四週年紀念

## 在抗戰中怎樣學習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 柳 滄

### 一 懷念先生

時間真的過得太快，我們別了先生不覺又是十三週年。人總是有回憶的，這十三年中，中國風雲變化，人們的記憶裏總不免有了許多傷痛的痕跡，然而我們一想到先生，一遇到這三月十二日，我想，不管思想、信仰如何不同的青年，只要是站在中國革命的立場上的，不能不追憶先生，思念先生。

任現實是如何艱險、陰暗，中國革命的青年從未誤解過先生，從未對先生的主義、遺教、發生過根本的懷疑。我曾碰到一位在極艱苦中受難的青年誠摯的問我道：「你想，倘若中山先生在世，中國是否是今日的樣子？我們是否還有這一番的受難呢？」

「他自己的答案，是一決不會如此！」青年對於先生的信仰是如此的深厚的。

我還記得，民十三年在北平的友人，雖在十年以後，一談到北平的生活，總不由得不聯想到先生那次北上，那漫天大雪天安門前的恭迎，三月十二日前對先生疾病的關心，三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我們接到先生的哀耗，學校宣告停課的喪鐘，當時我們情緒的緊張，沉默的致哀，以及北平萬千青年恭候在鐵獅子胡同前，熱情的等候與先生的遺容作最後的一面，以後先生的身體由協和而移到中央公園，中央公園追悼的盛況，以後由公園而移西山，這一中國空前的哀悼與執拂的行列。啊啊！這一連串的記憶，永遠是在當時在平的青年的心裏的。多少少男少女流下了淚來，多少少男少女從那天以後就開始讀先生的書，多少少男少女就在中央公園追悼會公開徵求國民黨員的名冊上，堅毅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從此歸依了先生，作了國民黨員，這是說明了什麼呢？

這是說明了先生革命的人格則偉大，先生的主義的實踐性、三民主義所包含的中

國革命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是中國革命的精髓，這是一切思想、信仰不同的青年，不能否認，不能不一致的擁護的。

我們祇有這樣瞭解，才能解釋中國青年對先生那般熱情的原因。然而，在這十三年中，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中，多少青年在三月十二這天，在受苦受難中，私自流下了傷心的眼淚。這在今日回想起來，是一件傷心的往事。但是抗戰爆發後，把這一切傷心的往事都結束了。

今日我們全民族是在空前沒有的團結中，中國民族已在日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進攻中，形成了民族統一戰線，在這統一戰線下，發動了神聖的民族戰爭，十年的歷史過程，今日仍舊回到先生所指示的道路上來，這是今年我們做國民的人萬分興奮、歡呼的事，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對日戰爭，現在高於一切的問題是如何能够改善戰爭狀況，支持長期抗戰。當這艱難困苦的今日，我們紀念先生，不能不心平氣和地來研究先生的遺教，以及先生所指示的一切革命的方略。我們除開用最大的忠誠與勤懇來

學習先生的遺教，發揚先生的學說，同時忠實的執行先生的遺教與指示的革命方略，以挽救目前的危機，不能算作先生忠實的信徒，或瞭解先生，敬仰先生的國民。

展開先生遺教的學習啊！宣揚先生的革命學說啊！實行先生的革命主義啊！我們今日全國民衆要爲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鬥爭！

## 二 全部遺教的幾個特點

先生的遺教所包括的東西是非常豐富的，提到遺教的繼承與發揚，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今日，我們在軍事紛忙中，應該從何處開始呢？

我們至少應對先生的全部遺教有下面的認識。

第一，我們要瞭解先生是一個澈頭澈尾的革命家，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思想家、政治家、學者。先生的學說，主義是產生在中國近百年社會的發展的階段中，先生一生是以實踐第一，不是像那些純粹學究一樣，只專心於自己學說的體系的建立。研究

先生的學說與主義的人，如果不從中國社會發展史中去理解先生，不從中國革命中去理解先生，而將先生的學說與主義作爲一部經典來看，那永遠也不會理解先生，反而只有曲解先生全部遺教並與革命乖離。

第二，因爲先生是以實踐第一，而中國革命最最基本的要求，先生天才的發覺到是這三個，即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先生將這基本要求，發揚成一種救國主義。先生絕對沒有把他的理論凝固成一個不變的體系，來束縛、限制三民主義的發展。恰恰相反，從先生學說與主義發展的程序看，是從單純反滿復漢的思想，反專制的民主的思想，資產階級性的土地改革的思想，漸漸發展爲現代民族主義，比資本主義各國的民主制度更高度的民權主義，同時充分帶着社會主義性的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普遍性，三民主義內容的豐富，是因爲先生能够吸取中外古今改革社會理論的精華，先生不排除外來思想，同時也不盲目的固守着中國歷史的傳統，所以先生一生從不拒絕世界新的思潮，但決不只是販運洋貨。一切新舊的東西，到了先生的腦內，

就融匯會通，成爲先生思想發展的原料。因此，先生的學說與主義，是時刻在發展中。所以，我們要了解先生的學說與主義，要站在先生這種革命的、發展的觀點看，才不會誤解先生。如果將先生的遺教，固定在先生的某一階段，那完全是違反了先生的本意的。

第三，先生對於三民主義一向不是當作三個無關聯的東西，這是因爲先生認清中國革命這三個主題，有着必然的聯繫，單單解決某一問題，是不能達到解決的。在辛亥革命以後，先生認爲革命失敗是因爲當時握着政權的袁氏，以及當時的黨人，不能了解先生民權、民生主義的意義，沒有實現民權與民生主義，即說革命是失敗了。所以先生一向是反對自己的黨人將三民主義分割來看，隨便採取某一部份，丟掉某一部份的。我們研究三民主義，特別要注意它的聯繫。

第四，因爲先生是實踐第一，所以除研究三民主義外，必須同時注意到先生革命的政綱。在先生的革命政策中，最輝煌、最天才的指示了我們，中國的革命力量，在

主觀方面是民族內部結成一條民族戰線，在客觀方面，配合世界愛好和平，不侵略中國的國家、民族和人民，結成親密互助的關係，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在這一認識下，先生手定了容共，工農，聯俄三大革命政策，及對國內弱小民族的政策。研究三民主義，如果將先生的革命政策割裂開來，都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的。

### 三 民族統一戰線下共同救國的問題

真理永遠是不會湮沒的，今日全國力量又復團結一致，而國共兩黨第二次的作了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這決不是偶然的。這一次全國團結，雖然是十年以來破天荒的事，但不是新的事，這條路仍不過是先生過去所指示的。我們歷史的條件，決定我們非走這條路，我們的民族即不能自存，這是中國革命力的泉源。

據八個月來抗戰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我們不獨心服先生指示這一條路的目光遠大，氣量宏闊，同時它真正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唯一真理我們當前爭取抗戰勝利最基

本的一點，就在這裏。我們看得明明白白，我們有了民族統一戰線，我們才能起而抗戰，但是，因為我們的統一尚不鞏固，歷史還留了許多渣子，在妨礙這兩大車輪的進展。所以我們在抗戰的第一時期中，不能不受到相當的挫折，並且一直到今日，這些渣子還在阻礙、延緩戰局全面的改善。這是萬分值得我們警惕的。當前戰爭要求各集團間排除一切歷史上的仇恨，而澈底接受先生的革命政策，將民族統一戰線，作進一步的鞏固與擴大，達到真正的動員全民族的力量，而進行全面全民族的戰爭。這是打開當前的難局、改變戰爭狀況、支持長期抗戰、達到最後取得勝利的前提。

怎樣才能使民族統一戰線達到鞏固與擴大呢？我們做國民的人，仍然心服先生的指示，希望國共兩大黨切實合作，在這一階段中，要做到共同救國，在抗戰勝利後，仍盼共同建國。

我們在先生的遺教中，完全看出這種希望的可能。先就共同救國來說罷！

是的，這已經是當前的事實。但是在一年以前，這一種可能，是很少人相信的，

許多人恐怕連夢也沒有夢到會有今日的罷。我已經在前面說過這不偶然的。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祇要國共兩黨不離開中國革命的實踐，歷史終究決定了國共兩黨攜手共進的。這八個月的抗戰，已經暴露了我們各部份的弱點，在抗戰中，也緩慢的改革了不少，在許多政策上，國共兩黨，在事實上我們已看出一天天更接近了。抗戰越是繼續下去，我們自家的弱點也越看得清白，改革的要求自然也越迫切，改革方式與速度，也會愈發明快、迅速。

好在現在大家的目標只有一個，是爭取先生的三民主義及革命的政策徹底實現。

我們在抗戰中已深刻的認識：目前是民族戰爭，民族的利害自然高於一切，所以要把國內階層的利害放到次位上去，大家合力先搶救中國。但這一個全面全民族的抗戰遂行，並不能絲毫忽視民主自由，民生改善兩個問題，因為要動員廣大羣衆，不能不改善羣衆最低限度的生活，不能不給羣衆充分的愛國自由。這種要求，已經在抗戰中表現得明明白白。爲什麼在太原失守以後的山西，民衆動員，比以前容易，爲什麼

今日第五戰區民衆比起京滬戰區過去的民衆積極，就是因爲今日的山西，和第五戰區實現了三民主義之一部份。由於歷史教訓，實踐要求，我們相信今日堅持抗戰的人，不問國民黨、共產黨，或無論任何黨籍的人總沒有不希望戰局改善的。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爲實現三民主義鬥爭，本是國民黨人的天責，在共產黨方面，既認明當前階段救國唯一途徑，也是實現三民主義，那在理論上原說不上再有什麼磨擦，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今日，只有聯合向日寇和國內殘餘的封建勢力與漢奸鬥爭，沒有自己內部再消耗自己的力量理由。

過去的經驗已經昭示我們，只有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全民族的力量才能集中起來，要有了這一種巨力，我們才能轉敗爲勝，取得抗戰最後勝利，同時國共兩黨的結合才能進一步的鞏固。現在的時機是萬分迫切啊！國共兩黨明達之士，一切其他的黨派與愛國民衆，我們在中山先生的十三週年的祭日，大家合力來爭取先生偉大的遺教的實現罷！

## 四 民族統一戰線下共同建國問題

是的，現在一般人對於民族統一戰線還有一種懷疑，以為大家在患難中，共同救國，也許可以沒有問題，等到驅逐日寇出中國後，那時大家又怎樣呢？所謂統一戰線下的建國問題，就被人懷疑了。在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是否也可以找出統一建國的理論的根據呢？

這一個問題原是比较遠的問題，在今日空口來推測將來，似乎不是必需。但在鞏固今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信念，這種懷疑是必需克服的。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僅僅是這一個階段中的東西？僅僅只有這一短促的歷史階段？中國革命過程中，是否還不免於一次流血鬥爭呢？

無疑的，這要用理論來說明，單單由參加統一戰線的各集團宣佈自己的忠誠，那是不夠的。

依據我個人對中山先生全部遺教的認識，再遠觀世界經濟政治情形的發展，與乎中日戰爭結束時期中國經濟、社會可能想到的情況、民衆的要求、進而推斷中國來日的建國問題，我們可以確認，新中國的建國問題可以在統一戰線下完成，有它的理論的根據。

第一，我們不要把三民主義作爲靜止的、不發展的東西來看，我們要從三民主義的發生發展中，認明了三民主義的特性。中山先生自己說過：「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依據中國革命階段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所以三民主義及其建國方略，是適合這一革命階段的東西，但是中山先生是否就沒有更高的理想了呢？不！中山先生的最後的理想是世界大同，他主張「天下爲公」，所以他對共產主義絕對不像一般資產階級革命家一樣敵視它，恰恰相反，他又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理想，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先生容共、扶持工農、聯俄的主張，就是確立在這種觀點中。這在先生的遺教中，有明白的根據。如果中國社會經濟能

達到社會主義階段。中山先生又在世時，我相信他不獨不會出來反對，反過來，會由他自己的天才的手進而領導社會的改革。本來三民主義進一步的發展，民生主義的延長，就是社會主義的階段，這是不難了解的。所以那些把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對立，將三民主義限於救國階段的人，那是根本不了解先生偉大的遺教，而反將先生的遺教限於一個狹小的歷史階段。所以如果中國在抗戰達到勝利的終結時，就是社會經濟的要求，有轉向非資本主義的新國家之建立，三民主義的信徒，自然沒有反對的理論根據與必要，那時久共患難的各政黨，共同起來建造新的國家，這決不是幻想。

第二，我們要瞭解中國抗戰勝利的終結決不是短時期可以期望到來的，所以我們說長期抗戰。長期抗戰的終結是什麼呢？我們可能想像，是打敗了敵人，同時自己一定也是疲憊不堪。國內經濟的破壞，物質的毀滅，一定比起俄國革命時期要有艱苦。那時雖然世界的環境，也許比俄國革命時代要好，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更達到另一高級的階段，也許世界其他國家，如日本已發生了無產者革命，我們在這環境中，也許

可以得到俄國革命時期更大的外援。但是，我們的建設，那總是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我們重整國民經濟，應該再走什麼道路？似乎不會成什麼問題，那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必然的撤退，我民族資產的力量亦必變得甚微，私人資本勢力決沒有能力來復興中國，事實上，一切主要的經濟骨幹，是要用國家的力量去完成的。這時個人資本的量在國民經濟的力量對比既微，我們相信那時各政黨對於經濟建設的問題，不會生出如何的差異，因為這時真的大家都變為小貧、赤貧了。既沒有大的資本勢力，封建殘餘的勢力又早在抗戰中滅亡，買辦資本勢力亦因帝國主義的勢力的撤退而不存在，而國際經濟情勢又正轉入社會主義的潮流，中國在這時，各政黨間是不會怎樣堅持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將階級的利益提高到民族利益之上的，並且統一戰線的中心是國共兩黨，國共兩黨在自己的主義上既有其共同之點，在此建國的關頭，不僅沒有分裂的可能與必要，在政治上，很有可能達到在與殘餘的帝國主義或封建資本勢力的鬥爭上，取得更親密的合作，這也不完全是不可可能的。

第三，中國抗戰勝利後的民衆，我們可能想像到他們的政治水準一定提到相當高度了。這時，如果一個階級要爲了少數人的私益，而引起國內戰爭；屠殺民族戰線中多年共同艱苦抗戰的盟友，必定要遭受民衆的反對、唾棄，羣衆的力量一定能够制裁這時的好亂者。這時人民因疲於久戰，一定普泛的表現厭戰的心理，因此內戰亦不允許發生起來。

基此，我們沒有理由，認定在民主統一戰線下不能共同建國的問題，因此也就沒有理由認定民主統一戰線只是一個短促時期的東西了。

總之：我們對於抗戰前途是樂觀的，這在中山先生的遺教中，已指出了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一切可能。但是怎樣將這些可能變爲現實呢？那我們首先要接受中山先生的「實踐第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爭取中山先生的遺教，普泛的、系統的在抗戰中實現！

# 紀念中山先生

韜奮

本月十二日是中山先生逝世的十三週年紀念，想起在十三年前的今日，記者晨起看報，瞥見報上赫然登載着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電訊，拿着報的兩手突然顫抖着，不由自禁地爲之震悼下淚。記者僅於孩童時代看見中山先生遊歷到福州，乘着藤轎，於萬衆歡迎聲中拾過街道；再一次則不過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時代，偕同同學到大學部聽過一次中山先生的演說。但一聽到他的噩耗，就不由自主地感到這樣深切的哀痛全是被他一生爲着中華民族奮鬥至死的偉大精神所感動，我並且深信和我同感的有着千千萬萬的羣衆，不僅是我這一個人的感想而已。我們在今天紀念中山先生，在中華民族生存亡已到最後關頭的今天紀念中山先生，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應該秉着中山先生爲民族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國民黨之民族主義

，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我們紀念中山先生應時刻不忘先生所終身努力的這個目的而堅持抗戰，以集體的力  
量，秉着中山先生奮鬥到底的毅力與精神，「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

除奮鬥到底的毅力與精神外，中山先生的遺教對於今日抗戰有暗示作用而爲我們  
所應惓惓服膺者很多。例如在積極抗戰的今日，大家都深刻地認識發動民衆及全民抗  
戰的重要，都深刻地認識鞏固民族統一陣線是堅持抗戰及爭取抗戰勝利的先決條件，  
中山先生也顯明地指出中國民族解放的努力，「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  
若智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  
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又說「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  
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  
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均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宣言）這是多麼確切的指示！我們在積極抗戰的今日，大家應不忘中山先生所鄭

重叮囑我們的：「所持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以及「與民衆深切結合」。

在這抗戰時期中，大家除注意「自力更生」外，同時也狠關心於「外交路線」，關於這一點，中山先生在遺囑中所詔示我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了，但是尤其使我們看了發生深刻感動的是他在臨終時寫給蘇聯的最後一封信裏所說的話。他說「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合作。……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迎強盛獨立之中國」。

我們要共同努力建立「強盛獨立之中國」才是真正紀念中山先生！

# 紀念孫中山先生

新華日報

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偉大的導師，領袖——中山先生辭世以來已經十三年了！當此國難正殷，抗戰方酣之時，追憶先賢，彌增感奮。

中山先生爲謀中國獨立與自由，奮鬥垂四十年，他以全部精神力量，交給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直至彌留之際，仍諄諄以繼續完成其遺志爲囑。中山先生從反對腐敗黑暗滿清專制政府開始其革命的事業，繼而反對貪橫殘暴軍閥統治及國際帝國主義之侵略。在孫先生畢生的奮鬥中，其堅持不懈，其臨危不屈，其遇難不辭，其捨身爲國，其廉潔無私，其對勞苦羣衆的極懇切的同情，其對壓迫者剝削者的極深刻的仇恨；在在均足爲我大中華民族之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概的圓滿的表現。在在均足爲爲民族解放事業而努力的戰士與青年的模範。

中山先生爲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喊出了中國最廣大的人羣衆的迫切和根本的要求；無疑地這是「數萬萬人底深刻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思想」（列甯）。什麼是三民主義？這在孫先生手訂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會宣言中，曾有明確之定義：

「（一）民族主義：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獨立自由於世界。……第二方面，……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一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二）民權主義：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三)民生主義：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并為之整頓水利移植荒郊，以均地方。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動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為求中國之強盛，民生之幸福，孫先生復手定建國方略，確定國家工業化之計劃及力主耕者有其田，這亦是民生主義不可分割的部份。

於此可見，三民主義之目的，實為求得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在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正如列甫所說：

「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的真正偉大思想，該民族不懂善於因自己的長期的奴隸

狀況而痛哭，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爲善於去向長期壓迫中國的人作鬥爭。」

三民主義正是這偉大的鬥爭之光榮旗幟。每一個忠於民族事業的戰士，應該善於繼承這個偉大的思想，保護這個光榮的旗幟，并在新的條件與環境中發展他，實現他

中山先生不僅爲中國近代的傑出的革命家與思想家，並且是偉大的戰略家。他不僅有着偉大的思想，崇高的目標，而且他規定了實現這個思想，達到這個目的的方針和道路——革命的三大政策，即聯俄容共與扶植農工。中山先生在遺囑中鄭重地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衆共同奮鬥。」在致蘇聯的遺書中，熱烈的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將以良友及盟國而迎強盛獨立之中國」。中山先生更於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他不僅和共產黨訂立親密的統一戰線，而且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先生的三大政策實爲實現三民主義之唯一的正確的方法和道路。沒有三大政策就不會有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實施

。觀乎十三年改組後革命運動之發展，國民黨力量之生長，北伐戰爭之長驅直下，顯乎是後多年我們民族所受之苦難和磨折，更證明中山先生之遠見。三大政策是達到中國自由平等，達到三民主義理想的實現所必需的方法、工具、道路。這是我們民族解放運動不朽的領袖，遠見地規定了的勝利的戰略和南針。

當着今天——民族自衛戰爭劇烈地進行着的今天，我們紀念中華民族的不朽的導星領袖的時候，我們應該學習他的堅苦卓絕的革命史蹟，我們應該高舉他的代表我們偉大民族偉大思想的三民主義之旗，我們應該忠實的遵循他的三大政策之路，結成鐵一般的隊伍，緊攜着手，迎接強盛獨立中之國的來臨。

## 三民主義研究提綱

許信文

### 一 三民主義產生的背境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是 孫總理在民族主義中開頭第一句所給與我們的指示，在這個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戰中，加深我們對於這個救國主義的認識，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一種學說一種主義之產生，必有一定的客觀條件作牠的背境。爲了要明白地把握這個救國主義，我們就應當探討產生這個主義的客觀背境。

第一，中國社會在滿洲貴族與漢族的官僚地主商人的聯合政權統治之下，封建剝削一天天的加兇，人民的生活一天天的痛苦。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歐西各國尤其是

英國的鴉片與棉織品之大量輸入，一方面使白銀源源外流；一方面又使家庭工業受到嚴重的打擊，鴉片戰爭的結果，五口通商和關稅自主權之喪失，更大張外國商品之市場。而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則使民衆的負擔更加繁重。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加上連年災荒，於是，太平天國便在廣西起義了。

太平天國是一個偉大的農民革命，它包含着濃厚的民族主義的原素，從對內來說，牠反對一族孤居在上的滿人，和甘作漢奸的地主商人；從其對外來說，牠又反對先進資本主義列強之侵略——美將華爾和英將戈登之幫助滿清撲滅太平軍便是明證。太平天國失敗了。經過英法聯軍、甲午之戰，列強不但在中國獲得內地經營工業和內河航行的權利，而且以借款的關係逐漸統制中國的金融財政，以租借的名義獲得了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重要的地域，劃分勢力範圍。這麼一來，中國便淪入半殖民地之中了，這種半殖民地的地位就激刺民族主義之產生，但同時却促動了改良派的維新運動，然而戊戌政變，尤其是日俄戰爭的結果，證明君主立憲的絕路；八國聯軍入

北京的結果又暴露了清政府之腐敗無能，於是民族主義運動便一日千里了。

從國際方面來說，資本先進強盜已在前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完成其世界分割，世界上形成先進資本主義列強與被壓迫民族對立的陣勢，從此以後民族解放運動便以反對帝國主義爲其內容了，隨着強盜剝掠之加兇，反抗侵略的民族運動亦就漫延於全世界了，牠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中國民族主義之發生與發展的。總括上面，要研究民族主義發生的背景，應當注意下面一些問題：

帝國主義侵略的必然性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

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影響

太平天國革命

戊戌政變

## 辛亥革命

蘇聯的民族政策

土耳其獨立運動

印度朝鮮安南爪哇及拉丁美洲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西歐自工場手工業出現以後，商品生產日益擴大，這種日昇月盛的勢力與當時的封建領主的身份特權及地方特權不能相容，於是在政治上便爆發民主革命。十六世紀荷蘭之反對西班牙的統治，便是市民爭取民權的第一砲；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又是黃金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的壯劇；接着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所謂「天賦人權」的旗幟便高舉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着種種條件的妨礙，非常遲緩，因之產業布爾喬亞之力量，亦非常薄弱，但在國際民主運動的影響之下，中國的這種運動，亦就抬頭起來了。特別自中日戰爭以後，民主運動更加發展。針對着康有為的立憲運動，孫總理的

民權主義就在此時形成。到了同盟會成立時，「建立民國」便在它的綱領第三條具體提出來了。辛亥革命雖則推翻滿清，但封建勢力依然存在，軍閥之跋扈地主之專橫，仍使民主革命非開展下去不可，關於這一方面，我們應當注意下面的幾個問題：

爲什麼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時要以爭取民主作號召

歐美民主政治的批評

盧騷天賦人權的學說之批評

荷蘭獨立歷史

英國革命史

美國獨立史

法國革命史

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民主運動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何以又是民主革命

中國民主革命怎樣才能完成

民主革命與中國的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的民主之特點

第三，工場手工業，尤其是機器生產出現之後，做工的人便與從前大不相同，他們失去了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只有出賣勞動力才能生存，資本家便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去產生商品。由於剩餘價值之剝削，工人只有世世成爲工資奴隸。而且由於工作之條件之惡劣，工資之低下，由於新機器之發明與女工童工之引用，於是殘廢、早夭、失業與飢寒交迫的現象，便遍地流行了，爲了改變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便起來追求出路了，英國的憲章運動，工人盡了很大的作用，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則爲無產階級高舉火把的第一次，接着美國勞動者同盟便在一八六四年成立。這個工人的國際組織，在偉大的無產階級導師指導之下，安排下一座光明的燈塔，牠雖則以光榮壯烈的巴黎公社作它的尾聲，但偉大的十月革命却實現了牠的計劃。

其在中國，舊式工業隨着歐美乃至日本的資本主義商品之侵入而解體，在這個解體的廢墟上，所建立的現代工業，外國資本竟喧賓奪主占了優勢。煤礦、鋼鐵以及動力工業，民族資本的勢力固然薄弱得很，就是輕工業部門中，如紡織等業，也在外資打擊之下，奄奄一息。復以民族資本不但在比重上佔着下風，而且充滿了買辦性。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在反帝反封建之下，以國家的集體力量，是不能發展本國產業的，民生主義中之節制資本之用意，雖則鑒於歐美之社會問題，謀所以「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但同時，亦包含着以國家資本來對抗外國資本的作用。其在農村，因為土地集中的趨勢日益加劇，大多數的農民都在失地破產中，掙扎着騷動着，於是「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便成爲民生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了，關於這方面我們應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 資本主義的生產機構。

#### 產業革命的歷史。

憲章運動中的英國工人。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巴黎公社。

國際工人聯合之史的發展。

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

獨占資本時代的工人生活。

十月革命。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中國經濟的特質。

帝國主義資本與民族資本。

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

中國工人的生活狀況。

爲研究之方便起見，才分別來探討三民主義產生的背景。其實三民主義是統一的，產生三民主義的背景亦是統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規定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偉大的中山先生把握住這個任務，把牠具體化爲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所以從表面上去了解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不相聯繫地割成三段，是違背 總理的遺教的。

關於參考書方面，我以爲至少應看下面幾本：

中山全書。

國際問題草案（汪精衛著）

反杜林論（吳黎平譯）。

政治經濟學講話（張仲實譯）。

西洋史要（王純一編）

中國歷史教程（劉惠之劉希育譯）。

## 二 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產生三民主義的背景既明，我們應當進一步去探討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第一，從前邊簡約的敘述，我們已知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就淪入半殖民地的火坑之中，滿洲專制政府宰制於上，而帝國主義列強「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但在推翻腐敗的滿洲專制政府，而且在打倒帝國主義列強。辛亥革命已把滿洲政府推翻；但是帝國主義列強之侵略，則有加無已，「瓜分」之說雖然有一個時候變成「共管」的局勢，但自「九一八」以後，這種共管局勢却被日本帝國主義搗毀了。這個遠東強盜攫去了東北四省之後，又陰謀分裂華北，進行中日經濟提攜，全國大規模的走私。接着七月七日事變，全國性的軍事侵略便開始了，綏、察、冀、晉以至江浙，皆已成爲戰場，全國海岸線皆被封鎖，各地城市均被轟炸；而南京被佔領之後，東京閣議，復決定繼續進攻，明白露示敵人侵佔整個中國獨佔整個中國的陰謀！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不解放就亡國。百年來，被侵略、被壓迫、被蹂躪的半殖民地地位，激刺了這個「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的民族主義之產生；目

前亡國滅種的危機，更使我們「不得不繼續努力」爭取民族主義之實現，所以，民族主義第一方面的意義，就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

同時，民族主義不但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而且在使「國內諸民族得平等之結合」。滿清政府雖然是滿族與漢族地主商人的聯合政權，然而從民族關係上說，滿洲是「以一民族宰制於上」的，這種局面既為我們所反對，因此，主張大漢族主義，而欺凌國內其他民族亦是同樣應該加以反對的。尤其是在目前，日本強盜提倡什麼大蒙古主義與大回族主義來分裂中國民族的團結，以遂其鯨吞中國的野心。我們更應當明白承認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根據平等互助的原則，鞏固中華民國國內各民族的聯合，所以民族主義第二個意義是在承認「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總括起來，民族主義「有二方面之意義一則為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為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然而不論第一方面的意義也好，或第二方面的意義也好，其中心的內容總不外是反對侵略、爭取民族之生存與自決的。

怎麼樣才能實現民族主義呢？

孫總理在他的遺囑中已明白地指示，他「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達到「中國之自由平等」所必取之策略，關於這一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亦載明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若智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亦指明「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工農民衆尤爲必須」。其次「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明瞭其共同的敵人爲誰：對於共同之敵人而共同奮鬥，自助與互助，初無二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有聯合戰線之必要」，在這個聯合戰線中，首先應當聯合以援助世界弱小民族解放自任的蘇聯。土耳其之能脫離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而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蘇聯之扶助」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偉大的孫總理握住了這個事實所以遂有聯俄政策之訂定。

關於民族主義的研究，至少應當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民族主義的意義在那裏？對外的目的是什麼？

國內其他各民族的狀況

漢族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應當成立那樣的關係？

實行民族主義的基本力量是什麼？

蘇聯政策的意義

第二，爲要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就要有廣大民衆之參加。於此，我們便應該來研究民權主義了。

孫總理說「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戰爭」。但民主自由雖然爲近代「世界潮流的趨勢，然而歐西各國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所以，「民權主義於闡揚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則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在對內政策中更具體地規定「實行普通選舉，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從此，可見民權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在使民主自由「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然而這種民主權

利雖爲「一般平民所共有」，但「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肆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依此而言，漢奸賣國賊是不得享受民主權利的。

國內戰爭是中國和平統一的反對物。孫總理一生是主張和平統一來救中國的，因此，「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便成爲必然的結論了。真正的共和國，能够克服中國政治行政上的分裂現象，能够消滅軍閥割據和不斷軍閥戰爭的局面，能够在國內建立和平及安甯的秩序，能够成爲團結動員和組織全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武力去爲反對外敵而奮鬥的基礎。他在北上宣言中諄諄地提出促進和平的主張；他經過長時間，對中國學生會更明白地說：「我所主張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來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量解決國事。」至於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則爲「（一）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

（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隊；（九）各政黨），從此看來，民權主義的真義，不但在給與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權利，而且要使政府機關滲底民主化，容納其他政黨及民衆團體來共同負擔國事。

對於民權主義的研究，我以為至少應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民權主義的真諦是什麼？

何以在間接民權之外要實施直接民權？

建立共和國的意義。

聯共政策的意義。

第三，爲了民族解放，不僅在政治上動員民衆參加，而且應在人民生活方面加以改善。「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爲了要使全國農夫工人來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他們的疾苦是應當加以解除的，在這裏一方面要限制土地與資本之獨占；一方面要改善農民與工人

的生活。

關於前者就是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二大原則，「蓋釐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爲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之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價收買之，此即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之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關於後者，中國「農民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故「爲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惟有首先解放農民」，「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理水利，移殖荒郊，以均地方，農民之缺乏資本，以至於借高利貸而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對於工人的生活，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明白地規定「制定勞動法，

主張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並規定限制，女工在生育期內，應休息六十日，並照給工資」；「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不但在生活方面，給與以這般改善，而且在政治上亦規定：「農民以自力防禦侵害之原則」和「在法律上，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以保障工人農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權利。這便是有名的農工政策。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是互相爲表裏的。牠的真正的意義就是要經過民衆的力量與立法的方法，使農民獲得土地，即是把土地的私有變爲農民的私有，這種變動可以使農民生產能力能够自由發展，使農村和農民生活能够真正的改善。同時，節制資本與「改良工人狀況」亦是不可分開的，如果只努力於國家企業之發展，而忘記了工人生活的改善，那是與民生主義的本意相違背的，何況「工人在民衆中最爲主要」，工人的生活如果不改善，「則所謂民衆基礎就無從鞏固」呢？

關於民生主義之研究，我以爲至少應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民生主義的真義安在？

牠的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發展國家資本的問題。

「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關係。

農工政策的意義是什麼？

參考書可看下列各書：

三民主義。

全國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

當前一切關於民族統一戰線之言論。

## 二 怎樣爲三民主義之勝利而鬥爭

我們已經討論過產生三民主義的背景，亦已經討論過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現

在，遺下來的問題，是怎樣爲爭取三民主義的勝利而鬥爭。在前一章，我們固然聯系到實際問題——實現三民主義的政策諸問題，不過，那兒所講的，還脫不了一般性，尤其是在抗戰的今日，單單那麼講，未免太空洞，所以，我們不得不化些工夫，來討論在抗戰日益開展的今日，如何爲實現三民主義而鬥爭。

現在橫在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面前的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吞滅全中國的行動，「送來了亡國滅種的大禍」。蘆溝橋事變之後，全國性的「事侵略便開始了。敵人不但佔領平津侵入察綏以至山西，而且在「八一三」爆發了淞滬戰爭，江浙以至安徽亦皆成爲戰場。南京被佔領之後，東京閣議決定繼續進攻；所謂御前會議，又決定新政策採取斷然手段：澈底消滅抗日的國民政府。所有和此事有關係之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具體計劃，亦都在新政策內詳細規定。一月六日，又發表聲明，宣佈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政府調整國交。敵人滅亡中國的猙獰面目都完全在這個聲明書中曝露出來了。從軍事來說吧，敵人

已整頓車馬，進行第二期的進攻。企圖打通津浦線，以主力由徐州直向鄭州，配合着黃河北岸平漢同蒲兩線，及由合肥向信陽之敵，切斷隴海平漢。然後經平漢南下，配合江南西進之敵，包圍武漢，從這各方面看來，敵人要吞滅全中國的毒計不是猛烈地在推進着麼？

這是中華民族生死關頭的時候了。蔣委員長在其告國民書中，鄭重地指出，「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在目前，我們絕不諱言，軍事上有暫時的失利，領土上有部份的喪失，但是「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於今日戰爭之苦而不止者。」所以，「向前邁進」，爭取民族的生存乃是我們當前的任務，乃是我們爭取三民主義之勝利的中心關鍵。苟如不然，整個民族都成爲日本強盜的奴隸牛馬了，還有什麼民族獨立，

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之可言呢？說到這裏，「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信條，還有什麼疑義嗎？

澈底抗戰，乃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而全民族之鞏固團結，乃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中心關鍵。蔣委員長在去年國慶紀念日，向全國廣播演講，明白地提出：「我們已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之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而在事實上，我們的偉大團結，亦正是在向前邁進着，去年年底蔣委員長的告國民書和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之相繼發表，就是這一團結之具體表現。我們民族的這種團結，是敵人最恐懼的。因此，它使用盡鬼蜮技倆來進行破壞了。敵人這種破壞民族團結的陰謀，是通過親日派漢奸敵探來進行的。他們有的散佈失敗情緒，企圖動搖民衆軍隊抗戰的信心；有的披着左的外衣，高倡着種種破壞統一團結的辦法；有的製造文件，對甲非乙，對乙非甲；甚且實行嚮應日寇，在後方進行奪取政權的暴動，煽動傷兵作亂，煽動火線叛變，參加敵人指揮的便衣隊等

的，因此，我們要以萬方警覺性，揭破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粉碎漢奸敵探破壞團結的陰謀，實行更加鞏固更加擴大的抗日民族團結。

我們民族團結的障礙，一方面是敵探漢奸的挑撥離間，而同時，自己對於民族統一戰線許多問題認識之不足，也是引起誤會和摩擦的主要原因。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與否是分別朋友和敵人的最主要的標幟；有一些人不了解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部份是禍福與共，休戚相關；有一些人輕信敵人的惡意宣傳，以為目前的聯合只是暫時的，勝利以後，就會發生自相殘殺的悲劇。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有這樣的不正確的見解，必然會發生出一些不該發生的誤會與磨擦了。這對於抗戰是有莫大的妨礙的。因此，我們對於民族統一戰線實有加深去認識之必要。

加強民族抗日力量的團結，乃是爭取抗戰勝利之關鍵。在這裏，不但國共兩黨要作更親密的團結，就是其他一切真正抗日救國的黨派亦要吸收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中來；現存的名種工農軍學商組織，亦給與以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權利；至

於無組織的廣大的各界民衆，更要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方式組織起來，使他們能成爲抗戰中的生力軍。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國的人力、智力、財力、物力，才能動員得起來。

加強抗日民族團結，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乃是堅持長期抗戰的第一件任務。其次，在現有國民革命軍的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在這裏，政府方面，要將一切徵兵機關統一起來，號召指導和進行徵兵運動。各民衆團體要有計劃的到農村去，宣傳發動壯丁自動參加前線，討論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具體辦法。使有錢的人，負擔他們家屬的救濟；有力的人，幫助解決他們家屬的勞動，並發動羣衆，舉行盛大的慶賀的歡送，務使這一運動形成一個廣大的高潮。同時，這些軍隊，必須使其適合於對日作戰和新的技術條件，這些軍隊及其幹部的教育，必須特別着重於實際戰爭經驗的聯系，技術條件的提高，與政治訓練的加緊。他們的生活和待遇，必須從健全政治工作上，做到政治上官兵平等，軍民一致，連隊上經濟公開，廢除打罵制度，實行自

覺的嚴格紀律。

第三，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和充實統一的國民政府。領導抗日的國民政府，是舉國一致所擁護的，爲了使政府能够順利地完成領導抗戰，我們希望它更加進步，更加堅強。在這裏必須吸收一切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肅清貪污腐化份子，使政府一切機構和施政方針，能適應抗戰勝利的需要。

第四，實行國防經濟政策。在這裏，首先要努力建立軍事工業。依據目前可能的條件，我們應迅速的適當的分佈軍事工廠，於一些安全而便於製造和運輸的地域，應集中現金購置必要的軍火與製造兵工的器材，應利用國內外專門技術人才建立製造裝置新式的軍事器械，應迅速的打通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路線，以便利和加速一切軍事上的運輸。同時，執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救亡方針，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使全國生產者在抗戰時仍能得到生活上的保障。

此外，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亦是很重要的。不過這一點，必須以我們自己的統一團結努力抗戰爲前提。蔣委員長在去年國慶前夕的演講詞中，明白地指出：

「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世界各國對我們生出無限的同情和贊助」。就是這種意思。

上面所舉出來的五大端，都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根本任務。只有努力執行這些任務。我們才能够把日寇打出去，中華民族才能獲得解放，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才有前提。故可說，這些任務，皆是爲爭取三民主義的勝利所必須進行的工作。但是牠們本身，却又都是三民主義的組成部份。動員民衆參加抗戰，鞏固民族團結力量。不是與「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民衆參加」的規定，相符合麼？充實和加強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不是民權主義的一種表現麼？實行國防經濟政策，改善民生，不是民生主義之所應有事麼？不過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我們要奉行「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爲着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的原則；我們要以「民族解放爲中心做起，以達到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所以，民族

自由是以抗日爲中心而不是與抗日對立的；民生改善是在抗日條件之下實現的，也不是與抗日對立的。只有這樣了解，只有這樣進行，我們才能建立民族獨立，民族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

關於這一章，至少要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日寇吞滅整個中國的毒計。

日寇第二期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之研究。

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幾種人？

他們怎樣進行其鬼域的技倆？

民族團結的意義。

一般人對於民族統一戰線不了解的有那些主要問題？

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關的主要問題有幾個？

怎樣動員民衆來參加抗戰？

怎樣鞏固擴大統一的國民革命軍？

怎樣進行國際宣傳？

怎樣去改善人民生活？

怎樣去建設國防經濟？

至於參考書，我以為至少要看下面幾種：

蔣委員長對蘆溝橋事變的談話。

去年國慶前夕向全國廣播演講詞。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告全國民書。

中共去年九月一十日的宣言。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對時局宣言。

陳紹禹先生：挽救時局的關鍵（載羣衆週刊第四期）。

##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毛澤東

——與延安新中華日報記者談話——

問題六：現在有人說共產黨既宣佈相信三民主義，便不能再相信共產主義，先生對此問題的意見怎樣？

答：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有些人說共產黨員宣佈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就是等於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正式代表我們的黨鄭重聲明：這只是撥弄是非者的謠言，這絕不合乎事實。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宣佈願意與國民黨同志們一起去爲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業——即爲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的三民主義的事業而奮鬥；同時，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自己虔信多年並爲之犧牲奮鬥多年的共產主義。其次，有人說，如果你們宣佈爲三民主義實現而

奮鬥，同時又信仰共產主義，這便不合乎 民主主義的立場。因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不相容，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再一次鄭重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對的。這種說法完全既不合乎手創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動，也不合乎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從理論上看起來，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等主要內容，與共產主義所主張澈底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使中國人民達到民族獨立；澈底摧毀封建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主自由；澈底改造中國經濟制度，使中國人民達到民生幸福，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絕不是不能容和的，因而本黨與國民黨也不是不能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的。關於這一點，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不止一次地明白指示過。例如，在民生主義第二講裏，中山先生公開指責有些國民黨員這種意見的錯誤。他說：「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去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爲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

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爲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

（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義第二講四十二頁）由此可見，中山先生公開指出國民黨員中有些同志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是一種誤會。爲什麼發生這種誤會呢？中山先生在這段演講裏（即同上全集的四十四頁，四十五頁）特別指明是：一般地是由於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義的互相結合性，特別是由於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義，因此，在解釋這種原因以後，中山先生在這篇演講裏繼續說：「爲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一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爲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行三民主義便够了，共產主義是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都是以什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

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不能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孫中山先生在講演中接下去發問說：「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 一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即是不能以個人的行爲，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麼，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麼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從中山先生這段演講裏面，我們應當得出那些結論來呢？

結論應當是：第一，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能夠相容並存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第二，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是不懂三民主義的人，特別是不知民生主義爲何物的人，這些人應該是國民黨中的極少數；同樣，認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也是不了解共產主義的人，特別是不了解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相互關係的人，這種人也應該是共產黨中的極少數。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中山先生認爲這只是某一方面的個人行動，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來反對另一方面的全黨及其主義；第三，中山先生認爲不僅主張共產主義的人，應該了解三民主義；同時，中山先生指示，主張民生主義的人，也應該細心去研究共產主義，這是一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態度。我們共產黨員非常贊美中山先生這種態度。的確，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和主義，不會是某一部份人或某一個黨的專利品，她應當而且必然歡迎別的任何人 and 任何黨來研究來實行的。我們不僅願意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樣，我們更歡迎任何人——首先是國民黨的同志們遵照中山先生

的指示來細心研究共產主義。因爲我們深信：凡是願意爲人類解放事業奮鬥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人，一定會承認馬克思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共產主義社會是全人類最美滿最愉快最幸福約社會，絕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國近代最偉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說：「……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斷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主義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主義，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尚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義第二講第三十八頁）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中山先生會說：「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以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

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從以上所說的一切，你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親手著作的三民主義理論中，絕對找不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指示來。至於講到中山先生對這問題在行動中的表現，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後，中山先生與共產黨員便有着親切的關係，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決心改組國民黨時，便公開與共產黨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常非親密的，即不僅建立國共兩黨的國民革命聯盟，而且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組織中去，共同擔任革命的工作。當時共產黨在全國不過幾百黨員，成立歷史不過幾年，而且共產黨員並以個人資格去加入國民黨，去共同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即在那種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產黨員提出過除三民主義外不允許同時相信共產主義的要求呢？沒有，即在那種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許國民黨一黨存在，不允許共產黨同時合法存在的主張呢？沒有！不僅沒有，而且中山先生還堅決反對別人提這種要求和這種主張。這正是中山先

生偉大遠見和洞悉實情之處，因為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義和政黨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絕不是可以強制制止或取消的，古今來為信仰而殺身成仁的不可勝數，任何有社會基礎和羣衆擁護的組織，絕不是可以強制解散或消滅的，古今來多少革命團體在萬重壓迫極端鎮壓下依然存在和發展。而現今的情形，比之當時，還更不相同，中國共產黨已經有十七年奮鬥的革命歷史，有數十萬黨員，有久經戰鬥的堅強組織，有為主義為黨為革命為中國人民解放和為全人類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奮鬥的領袖和幹部，有千百萬羣衆的信仰和擁護，那裏能談得到取消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信仰和黨的組織呢？如果說只是因為我們宣佈了我們愿為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一層，就應當取消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這完全是誤解，因為我們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相互關係的了解，的確如中山先生一樣，即我們認為牠們是好朋友是相容的，所以我們共產黨員不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曾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去與國民黨同志一起，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即在國共分家後

，我們在自己單獨的革命苦鬥中，也還是爲的中國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即是與三民主義根本思想相符合的目的。今天和過去國共分裂時不同的，只是過去我們共產黨員在國共合作破裂後，單獨地爲自己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事業而奮鬥，今天在國共重新合作時，我們共產黨員又與國民黨同志們在一起爲共同的革命事業而奮鬥。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有人要求共產黨員放棄其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組織，這不僅不能爲共產黨所接受，而且直接違反着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動。

從中國的實際情形看來，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蓬勃發展，和北伐軍的偉大勝利；而國共關係破裂，便造成了十年來外患內憂空前嚴重的局面；現在國共兩黨一經合作，對外便能發動空前未有的光榮的民族自衛抗戰，對內便能造成近數十年來空前未有的政權和軍隊的統一，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各黨派各階層力量的大團結，使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感覺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

關頭中的唯一生機和希望。兩個主義和兩個黨同時合法並存，對於中國人民和國家是  
有利或有害，應該根據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實來判斷，而不應該根據少數人的偏見和  
主觀願望來決斷根據。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鐵一般的事實，既經一再證明：三民主義  
與共產主義互助合作，則國家統一，革命發展；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互相對立，互相  
否定，則國家分裂，革命困難，所以任何違反這種事實的意見，必然都是不能實現的  
，——設或不幸而實現了，定造成國家民族新的災難。

由此可見，認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能相容的意見，以及由此而認為國民黨與  
共產黨不能同時合法並存的意見，都是毫無根據而且有害國家民族解放事業的意見，  
這種意見既違背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動的遺教，又違反中國的實際情形，這種意見的  
實際危險，就是把目前舉國一致對外的良好政局，轉促成視線對內增加內部困難的可  
能局面。

## 最可紀念的一日

張仲實

十四年前（即民國十三年）的今日——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可紀念的一日，它與辛亥革命的紀念日——雙十節，有着同樣重大的意義。我們知道，在辛亥革命那天，中國人民在中山先生領導之下，顛覆了滿清專制制度，變更國體，肇始了中國民主制度的端緒；在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這一天，中國國民黨在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又實行改組，確立了它的聯合蘇聯國共合作及扶持工農三大政策，奠立了以後大舉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基礎。中山先生在他的開幕詞中很高興的說道：

「今天在此開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這是本黨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黨以來的第一次。我們革命黨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許多熱烈的血，備

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才推翻滿清，變更國體，但這三十年中，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機會開全國國民黨大會。所以今天這個盛會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革命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L（見中山全書第三集一三九頁）

在十四年後的今天，在繞了一個大圈子而國共重新合作的今天，在全國高舉抗戰旗幟以血肉與敵人搏鬥的今天，遇到這個紀念日，記者想，每個抗日的戰士，都特別感覺到它的可貴，中山先生見識的遠大，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黨綱的重要。

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這個最可紀念的日子呢？只有根據十年來苦的教訓學習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檢討我們在嚴重的國難期間的工作，是不是執行了中山先生救國的

遺志，是不是執行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政綱。

## 一一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政綱是什麼呢？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先把中山先生召開這個大會的目的，略加以說明。

據中山先生在開幕詞裏面所說，當時舉行這個大會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同上書，一四二頁）。而國民黨的改組，正是爲了改造國家。中山先生關於這一點特別側重的說道：

「今日民國的國基還沒有鞏固，我們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然後民國的國基才能鞏固，這個要國基鞏固的事，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此次各位同志來此開這個大會，和尋常的集會不同。我們自十三年以來，在政治上得了種種經驗，發明了種種方法，看到中國國家雖然不好，國勢雖然比從前退步，但

知道中國還有辦法，還可以建設得好。革命三十多年來爲良心所驅使，不論成敗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對於國家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去建設，至於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辦法，所以，此次召集各省的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就是把這方法公諸大家來採納。……」（同上書，一四二頁）

這些新方法是怎樣來的呢？中山先生說道：

「至於這些新方法的來源，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到的種種革命方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同上）可知中山先生對於各項政策的確定，是異常的慎重。所以，他所定的各項政策，都是很正確的，都是合於中國客觀的需要的。

在中山先生指導之下，大會工作的結果，便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宣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在分析中國的現狀和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並指出當時各派（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及商人政府派）意見的錯誤以後，便確

定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以後救國的政綱，並以簡單明確的語言，確定三民主義的內容。

關於民族主義，宣言確定它的意義有兩方面：「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求民族解放要拿什麼作後盾呢？宣言很明白的答曰：「實爲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的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同上書，第四集，三六頁。）

關於民權主義，宣言確定「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卽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關於這一層，宣言中還有幾句很扼要的話，值得引出來：「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受之，必不輕受於反對

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同上，三七頁)

關於民生主義，宣言確定「最後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要義，是在替「全國各階級中以受痛苦最利害」的農民謀利益，節制資本的要義，是在替「生活絕無保障」的工人大衆謀幸福。關於扶持工農與開展民衆運動，宣言中有一段說得更明瞭：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所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求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補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達以期增進國民革

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黨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同上，三九頁）

基於這個政綱，中山先生更定了三大政策，聯合蘇聯，國共合作，扶持工農。是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國民革命的勢力，便普及於全國，而推翻了北洋軍閥體系。

後來不幸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破壞、阻礙、挑撥、離間種種卑劣手段之下，民族統一戰線終於破裂，以致這一合於「中國革命需要」的政綱，未能實現，以致招來了空前未有的國難——「九一八」事變及其後日寇不斷向中國的大舉侵略！

### 三

十四年來苦的事實，苦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遵循着中山先生所確定的三大政策和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政綱，全國團結一致，尤其國共兩黨密切合作，才

是中華民族的唯一正確的生路；不然的話，便只有趨於滅亡。

同樣，十四年來苦的事實，苦的經驗告訴我們，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狂暴侵略的兇殘以及領土的喪失，並不足可怕，所怕的是我們內部不能團結，只要我們全國不分上下，也不分黨派，更不分階級，都能捐除成見，密切的攜手起來，即可造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目前最可喜的現象，就是自「八一三」全面抗戰逐漸展開以來，全國的團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已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十年來尖銳對立的國共兩黨，實行合作，而站在一條民族陣線上，來與日本帝國主義搏鬥。假使說國共兩黨第一次的合作，完成了打倒北洋軍閥的任務；那末，我們更可說，目前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定可完成驅勝日本帝國主義，達到民族解放的任務。我們今天紀念偉大中山先生的最好辦法，便是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達到驅逐日寇出中國並澈底地實現中山先生手訂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

---

說學與想思的山中孫

每冊實價叁角  
外埠酌加寄費

經售者  
各大書店

著者  
艾思奇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漢）版初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

---

10  
666064  
(3)